

季羨林讲演录



真情·真实·真切

季羨林

季羨林／著 蔡德贵／编

長春出版社

季羨林讲演录

季羨林／著

编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讲演录/季羨林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445-1153-7

I. 季... II. 季... III. 季羨林 (1911~2009) —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858 号

季羨林讲演录

著 者: 季羨林

编 者: 蔡德贵

责任编辑: 张中良

装帧设计: 姜旬恂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9 千字

印 张: 14.3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917482

前 言

季羨林先生最早的讲演可以追溯到1931~1932年,那时候他一片抗日热情,到沙河和清河镇宣传抗日。但是这些演讲都没有保存下来。

1946年在从德国回国途中,季羨林先生在越南短暂停留了一个月,其间应邀在西贡市的知用中学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内容是西域新发现的文字。当年听讲演的学生唐月梅和叶渭渠夫妇后来成为季老在北大东语系的学生。同年到南京后,在胡一贯的安排之下,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作长篇讲演,内容和在西贡市的讲演一致。上海则是由李长之安排做了同样内容的讲演。这三次讲演,同样没有保存下来。到北大之后的当年秋天,在红楼结识周一良,应清华老同学吴晗邀请到清华大学给学生做报告,住吴晗家里,讲西域的古代语言。1947年,季羨林先生回济南探亲,在济南期间为济南青年会做学术讲演:《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曾经教过课的学生杨思荣等人在青年会楼上宴请。解放后,季羨林曾经到北大出版社所在地国会街发表竞选工会的演讲;后来访问印度,在那里用英文讲演,这些讲演可惜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改革开放之后,季羨林的讲演很多,其中有在国防大学的讲演,谈爱国主义;在中山大学的讲演,谈陈寅恪的爱国主义;在山东大学的讲演,谈人文学科建设;……他讲演涉及最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核心的内容是以综合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中国文化必将弥补以分析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文化之不足,在21世界重现辉煌。

季羨林先生的讲演有一些是既无稿子,也无提纲,只是考虑长时间形成腹稿,到时候滔滔不绝地讲出来,有心人则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出来。本书收入的讲演,有的已经在其他著作中看到过,有的是第一次发表。第一次发表的讲演,大多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的,本来是准备请季老过目的,但是季老因为驾鹤西去,终于不可能了。这是永远的遗憾。

讲演稿的编辑是根据时间先后排列的。

编 者

目
录

前言	
印度文学在中国	001
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	013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023
要反映社会中的新风气	035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 会议闭幕词	037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闭幕式上的 讲话	040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44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050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052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072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075
1988 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083
1988 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085
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佛教文物	087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089
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南亚文化研究所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099
在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 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101

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	
座谈会上的发言	107
在“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周年	
暨俗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108
在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讲话	109
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1
国学漫谈	117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120
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130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132
在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研讨会上的讲话	137
西方不亮东方亮	140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147
对 21 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	148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	160
在母校济南一中的讲话	169
在人民大会堂上的讲话	174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176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	
仪式上的演说	181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183
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	188
在北大外院语言学研究所	
成立大会上的（书面）讲话	191
天人合一，文理互补	193
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
在小蟬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197
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98

在济南一中设立“春晖奖学金”	
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200
在《中国佛教史》编委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203
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表彰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205
东方文化	206
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210
附录一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214
附录二 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217
附录三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219

印度文学在中国^{*}

中国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国境毗连；我们做了几千年的好邻居、好朋友。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几乎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都进行了交流的工作。文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文学这一部分，正像其他的部分一样，交流的头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很多的。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下印度文学在中国所起的一些影响。

要想追本溯源，印度文学传入中国应该追到远古的时代去。那时候的所谓文学只是口头文学，还没有写成书籍。内容主要是寓言和神话。印度寓言和神话传入中国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著作里可以找到。《天问》里说：

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

虽然在最近几十年内有的学者把“顾菟”解释成“蟾蜍”^①，但是从汉代以来，传统的说法总是把“顾菟”说成是兔子，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说法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久矣了。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国产，它是来自印度。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

* 季羡林按：这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记得是讲课时发给同学作参考用的。观点当然是当时的观点，材料也是当时的材料。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尽管已经过了那样长的时间，但是里面的材料还是很有用的。而且在这方面还没有见什么人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样一来，我保留这一篇东西就不仅仅是敝帚自珍了。最近几年来，印度朋友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令人欢欣鼓舞的热情。他们翻译了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现代的有，古典的也有，比如曹植的《洛神赋》之类。但是关于文学方面的系统的著作却还没有见到。因此，我就把这篇文章拣了出来，加上了一点新材料，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很小的修改，整个的框架以及观点都保留原样，发表出来，供中外志同道合的学人参考。同时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倘加以搜集、整理与研究，会对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起很大的作用。我检查自己的旧笔记，发现我搜集的材料还有不少。我从前曾写过一些这类的文章。现在在这方面的兴趣更是浓烈未衰。倘有适当的机会，当再整理发表。

① 见闻一多《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1936年1月第4期。

起，印度人就相信，月亮里面有兔子。梵文的词汇就可以透露其中的消息。许多意思是月亮的梵文字都有 śaśa（兔子）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譬如 śaśadhara 和 śaśabhṛt，意思是“带着兔子的”；śaśalakṣaṇa，śaśalakṣmaṇa 和 śaśalakṣman，意思都是“有兔子的影像的”。

此外，印度神话寓言里面还有许多把兔子同月亮联系起来的故事，譬如巴利文《佛本生经》第 316 个故事。在中译《佛经》里面，也有不少这样的故事，譬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二一，《兔王本生》；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六，《兔品》；竺法护译《生经》三一，《兔王经》；宋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六，《兔王舍身供养梵志缘起》，等等。唐朝的和尚玄奘还在印度婆罗痾斯国（今贝拿勒斯）看到一个三兽宰堵波，是纪念兔王焚身供养天帝释的。

除了这一个月兔故事以外，在先秦的书籍里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寓言和神话，《战国策·楚策》里记载的一个狐假虎威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到了三国时代，中印交通的道路开辟了，来往频繁了，同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这些都给印度人民创造的一些美丽动人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传入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印度各种类型的故事就大量传入中国。

我只举一个例子。《三国志·魏书》卷二十《邓哀王冲传》：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我们在小学教科书念到的曹冲称象的故事，来源就在这里。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写入正史，而且同一个具体的人联系起来；但是它仍然不是国货，它的故乡是印度。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称象的故事。它也许在后汉时代就已经从口头上流传到中国来了。我现在把《杂宝藏经》原文抄在下面，以资比较：

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

（见《大正大藏经》卷四，449b）

到了六朝时代，印度神话和寓言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更加深了，范围更加广

了。在这时候，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类新的东西，这就是鬼神志怪的书籍。只要对印度文学稍稍涉猎过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这些鬼神志怪的书籍里面，除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固有的神仙之说以外，还有不少的印度成分。这情况，中国伟大文学家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早就指出过。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些鬼神志怪的故事里面有一些对中国来说是陌生的东西，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我们当然不能说，在佛教输入以前，中国就没有阴间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是比较渺茫模糊的、支离破碎的。把阴间想象得那样具体，那样生动，那样组织严密，是印度人的创造。连中国的阎王爷都是印度来的“舶来品”。

六朝时代有许多小说，全部书都谈的是鬼神的事情，譬如荀氏《灵鬼志》、祖台之《志怪》《神怪录》、刘之遴《神录》《幽明录》、谢氏《鬼神列传》、殖氏《志怪记》、曹毗《志怪》《祥异记》《宣验记》《冥祥记》等等。这些书，只要一看书名字，就可以知道内容。其中的《宣验记》和《冥祥记》主要是谈因果报应。里面宣传信佛得善报，不信得恶报。有一些故事已经中国化了，有的正在化的过程中，有的才开始，印度气息还十分浓厚。谁也不会相信，它们与印度无关。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印度故事中国化的过程。《宣验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有鸚鵡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爱重。鸚鵡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曰：“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①

从这个故事本身我们看不出它是什么来源。说它完全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未始不可。但是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十三，《佛以智水灭三火缘》和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二三，都有这样一个故事。为了比较起见，我把《旧杂譬喻经》的那一个故事也抄在下面：

昔有鸚鵡，飞集他山中。山中百鸟畜兽，转相重爱，不相残害。鸚鵡自念：“虽乐，不可久也，当归耳。”便去。却后数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鸚鵡遥见，便入水，以翅取水，飞上空中。以毛衣润入洒之，欲灭大火。如是往来往来。天神曰：“咄！鸚鵡！汝何以痴！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鸚鵡曰：“我由知而不灭

^① 鲁迅《古小说钩沉》，《宣验记》。

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悉为兄弟，我不忍见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则雨灭火也。

把两个故事拿来一比较，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宣验记》其实是抄袭了《旧杂譬喻经》，只是把一些字句润饰得更加简练而已。印度故事中国化可能有很多方式；但是大体上说起来，不外两大类：一是口头流传；一是文字抄袭。前者可以拿月兔故事做一个例子，而后的代表就是这一个鸚鵡灭火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变体，也见于《宣验记》：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飞故灭火。往来疲乏，不以为苦。

只是把鸚鵡换成了野鸡。这个以野鸡为主的故事，也来自印度。《大智度论》卷十六就有这个故事。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拘尸那揭罗国说：“精舍侧不远，有宰堵波，是如来修菩萨行时，为群雉王救火之处。”这里讲的也是雉王，而非鸚鵡。

我觉得这情况可以代表印度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印度人民首先创造，然后宗教家，其中包括佛教和尚，就来借用，借到佛经里面去，随着佛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士感到有趣，就来加以剽窃，写到自己的书中，有的也用来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劝人信佛；个别的故事甚至流行于中国民间。

鸚鵡灭火的故事就是按照这个过程传入中国的。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它的传播过程还不就到《宣验记》为止。清周亮工《柘园书影》第二卷中又出现了这个故事：

昔有鸚鵡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鲁迅全集》五《伪自由书》《王道诗话》（实为瞿秋白所作）也引用了这个故事。

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而广的影响，六朝以后仍然继续发展下去。到了唐代，可以说是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文学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东西：一是传奇；二是变文。而这两种东西都是与印度影响分不开的。

我们先从文体上来看一下这个影响。六朝那些鬼神志怪的故事，一般说都是很短的，每篇只谈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平铺直叙。但是到了唐初，却出现了像王度的《古镜记》这样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故事作为骨干，上面穿插了许多小的故事。这种体裁对中国可以说是陌生的，而在印度则是司空见惯的事。印度古代著

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结构就属于这个类型。作为骨干的主要故事是难敌王（Duryodhana）和坚阵王（Yuddhisthira）的斗争，里面穿插了很多的独立的小的故事。巴利文《佛本生经》是以佛的前生为骨架，把几百个流行民间的故事汇集起来，成了这一部大书。流行遍全世界的《五卷书》也是以一个老师教皇太子的故事为骨干，每一卷又以一个故事为骨干，叠床架屋，把许多民间故事搜集在一起，凑成了一部书。中译佛典里的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刘宋绍德、慧询译《菩萨本生鬘论》、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等等都同巴利文的《佛本生经》是一个类型。这种例子在印度文学里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很难说，唐代传奇文的这种新的结构不是受了印度的影响。

体裁方面另一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变文上。变文的结构多半是韵文和散文间错成文。有的地方叙事用散文，说话用韵文；有的地方悲叹用韵文；有的地方描写用韵文；有的地方韵文复述散文的内容。总而言之，就是韵文和散文互相间错。这种体裁也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来自印度。

古代印度的许多著作都是用这种体裁写成的。譬如用混合梵文写成的《大事》（Māhāvastu）和《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都是这样。在这些佛典里面，韵文与散文的关系大别之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韵文与散文相续成文；二是韵文的内容再用散文重复一遍。上面提到的《五卷书》也是用散文和韵文相间写成的。

中国接受这一种新的体裁，除了通过佛典翻译这一条路以外，可能还通过另一条路，这就是中央亚细亚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木师与画师的故事》在中译大藏经里有好几个异本：比丘道略集《杂譬喻经》八；《经律异相》第四十四卷；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六等等。这些异本都是用散文写成的，里面没有韵文。吐火罗文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却是散文和韵文交错。在中印文化的交流中，吐火罗文是桥梁之一。在这种体裁输入中国方面，吐火罗文也可能起了媒介作用。

上面谈的是文体方面的一些影响。在内容方面，影响还更要复杂，更要普遍，更要深刻。虽然唐代的传奇文从主要方面来说继承的和发扬的仍然是六朝以来的中国固有的传统，但是印度的影响却到处可见。上面谈到的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仍然存在。此外还添了许多新的从印度来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龙王和龙女的故事。

龙这个东西，中国古代也有的。有名的典故“叶公好龙”可以为证。但是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谁也没有看到过，谁也说不清。据闻一多的意见，龙只是一种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神秘虚构的生物，它似乎是蛇，又似乎不是。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以后，中译《佛经》里面的“龙”字实际上是梵文 Nāga 的翻译。Nāga 的意思是“蛇”。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佛教传入以后，“龙”的涵义变了。

佛经里，以及唐代传奇文里的“龙王”就是梵文Nāgarāja, Nāgarāj 或 Nāgarajan 的翻译。这东西不是本国产的，而是由印度输入的。

龙王和龙女的故事在唐代颇为流行，譬如柳宗元的《谪龙说》、沈亚之的《湘中怨》，以及《震泽龙女传》等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李朝威的《柳毅传》。不管这些故事多么像是中国的故事，多么充满了中国的人情味，从这种故事的本质来说，它们总还是印度货色。

谈到变文，印度影响就表现得更明显。里面当然也有不少的是讲中国的故事，譬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捉季布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等等都是。但是更多的却讲的是印度佛教故事，譬如《太子成道经》《太子成道变文》《八相变文》《破魔变文》《降魔变文》等等都是。此外还有许多讲经文，例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等等，也属于这一类。在变文里面，有一些对以后文学和民间传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在极长的时间内，目连救母的故事流行于中国民间，目连甚至有了中国名字，小说戏剧也取材于这个故事，可见其影响之大了。

印度文学影响唐代文学的内容当然还不限于上面说到的这一些，其他类型的故事也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属于梦幻的故事的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属于离魂一类的陈玄佑的《离魂记》、张荐的《灵怪录》和李亢的《独异志》，属于幽婚一类的戴君孚的《广异记》里的许多故事，里面都或多或少能够找到一些印度色彩。

是不是有整个的故事从印度搬过来的呢？有的，而且数目还不算很少。例子前人已经举出来过，我在这里再举一个新的例子。《太平广记》二八七，引《潇湘记》襄阳老叟，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一个老头那里得了一把神斧，“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后来给一个富人造一独柱亭，晚上爬墙去勾引富人的女儿。富人发觉了，要打发他走。他用神斧造了一双木鹤，同富人的女儿乘上，飞走。一个内容很相类的故事见于《五卷书》第一卷第八个故事。我看，这就是中国故事的来源。

就连柳宗元那一篇著名的文章《黔之驴》，我看，恐怕也与印度文学有一些瓜葛。我先把《黔之驴》抄在下面：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御，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踯，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据我的看法，这个故事与流行世界的驴蒙虎皮或狮皮的那一个类型的故事是有联系的，而这一个类型的故事来源就是印度。我现在把《五卷书》第四卷第七个故事译抄在下面：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衣匠，名字叫做叔陀钵吒。他有一条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虎。他想到：“哎呀！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看地的人会把它当做一只老虎，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就这样，随了时间的前进，它也就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牵到圈里去。

有一天，驴听到远处母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一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箭，把它打死了。

这两个故事非常相似。第一，里面的主角都是驴；第二，在《黔之驴》里，老虎亲自出台，在《五卷书》里，老虎虽然没有活着出台，它的皮却蒙到驴身上去了；第三，在两本书里，驴都是因为鸣叫而泄露了真相；第四，这两个故事都有教训意义，在《五卷书》里不必说了，而《黔之驴》本身就是“三戒”之一。

这一故事几乎流行于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类型。这里不详细说了。

宋代以后，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往来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贸易方面的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表面上看起来，印度文学似乎是已经停止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但是，倘若仔细观察研究，情况并不是这样子。这影响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是更深入、更细致了。

元代的戏曲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枝奇丽的花朵。很多杂剧取材于唐代的传奇，像马致远的《黄粱梦》取材于《枕中记》，郑德辉的《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取材于《柳毅传》，这都是最著名的例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印度文学间接影响了元代的戏剧。

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呢？少数的学者倾向于肯定的答复。他们想证明，某一“型”的中国戏剧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譬如“赵贞女型”。也还有人想证明，某一个杂剧受了印度的影响，譬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证明都是缺乏根据的。

明代是中国长篇小说开始发扬光大的时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西游记》里面就有大量的印度成分。要想研究孙悟空的家谱，是比较困难的。不可否认，他身上有中国固有的神话传统；但是也同样不可否认，他身上也有一些印度的东西。他同《罗摩衍那》里的那一位猴王哈奴曼（Hanumān）太相似了，不可能想象，他

们之间没有渊源的关系。至于孙悟空跟杨二郎斗法，跟其他的妖怪斗法，这一些东西是中国古代没有的；但是在佛经里面却大量存在。如果我们说，这些东西是从印度借来的，大概没有人会否认的。

同以前一样，在明代也有印度故事整个地搬到中国来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明刘元卿《应谐录》里面记载了一篇短的寓言，说一家人有一只猫，起个名字叫“虎猫”。有人建议说，虎不如龙，不如叫“龙猫”。又有人建议叫“云猫”，叫“风猫”，叫“墙猫”，最终叫成“鼠猫”。这样一个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但是大家都公认，它的故乡是印度。在梵文故事集《故事海》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五卷书》里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它从印度出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自从西方的殖民主义侵入东方以后，中印两个国家都逐渐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我们的文化发展受到了破坏。在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我们自顾不暇，几千年来文化交流的古老传统几乎陷于停顿了。

一直到20世纪初年，当我们两国的民族复兴的运动逐渐高涨的时候，我们这两个老朋友才才有了机会恢复以前的友谊。两国人民彼此关心对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这一个新友谊的基础。

和尚诗人苏曼殊在1909年4月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译了印度女诗人佗露哆(Taru Dutt)的诗篇。在同一年，他又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他准备同一位印度的梵文学者共同翻译印度古代最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婆的长篇抒情诗《云使》。是否已经译成，不得而知。

1924年，印度近代爱国主义的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访问。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事情。绝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都有专文介绍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作品。《小说月报》特别出了《泰戈尔号》（第十四卷，第九号、第十号）和临时增刊（第十五卷，第四号，《欢迎泰戈尔先生！》Welcome to Mr. Rabindranath Tagore!）。在这些专号和临时增刊里，中国的作家们详尽地介绍了泰戈尔，给他写了传，分析了他的思想，选译了他的作品。在他来华前后，中国可以说是有一股泰戈尔热。他的许多作品都译成了汉文，譬如《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等诗集，《邮政局》《牺牲》《齐德拉》《春之循环》等戏剧一时都有了中译本。

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影响当然也就不会很小。但是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我还是借用已故诗人徐志摩的话来说明这情况吧。他说：

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见《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

熟悉当时文坛情况的人就会承认，徐志摩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大。当时最流行是那一种半含哲理半抒情的小诗。这些小诗的蓝本就是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

一直到死，泰戈尔都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等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当中国人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未来唱出了他的热烈而真挚的希望：

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的未来的到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很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

诗人的希望今天可以说是都已经实现了。

中国近代的伟大作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很重视印度文学。他对汉译佛典中文学气味比较浓的那一部分进行过精细的研究。在他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里，他一再指出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他指出《汉武帝内传》窃取了佛教的东西；他指出，吴均《续齐谐记》里的阳羨鹅笼的故事说的的是一个中国书生，但是在晋人荀氏的《灵鬼志》里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这里不是一个中国书生，而是一个来自外国的道人。他用这一个例子来说明印度故事中国化的过程。他还把僧伽斯那撰、萧齐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痴华鬘》加以断句，付印。所谓“百喻”，实际上就是一百篇短的寓言和故事，名称虽是佛经，却是印度人民的创作，由佛教僧徒加以汇集利用。他之所以喜欢它者，原因也正在此。在《〈痴华鬘〉题记》里他写道：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

可见他对印度寓言估价之一斑。

此外，熟悉汉译佛典的人都会发现，鲁迅在运用词汇时有时候很受佛典的影响。这种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华盖集〉题记》里有这样几句话：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难，尝大欢喜，发大慈悲。

这里面很多词儿不是明明白白地从佛典里面借来的吗？

另外一个民主斗士同时也是白话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闻一多也很重视印度

文学。在他的文章里，他曾着重指出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还曾译过印度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Sarojini Naidu）的诗。

小说家和梵文学者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印度神话和寓言，有浓重的印度气息。他根据英文翻译过一些印度神话，像《太阳底下降》（*The Descent of the Sun*）和《二十夜间》（*A Digit of the Moon*）等等。他也曾研究过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他的结论我们虽然不能全部同意，但是其中有一些意见是站得住的，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此外，他还写过一部书，叫做《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但是比较全面地讲印度文学的书在中国这恐怕还是第一部。它从吠陀文学讲起，一直讲到近代文学，印度文学史上主要的作品和作家，主要的流派都讲到了。对想从事于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是一部有用的书。

小说家沈从文有时候也取材于印度的寓言文学。他利用这些材料主要是通过汉译的佛经。《五卷书》第一卷第十六个故事的内容是：两个天鹅和一个乌龟做朋友。天旱的时候，两个天鹅让乌龟咬住一个木棒，它俩各叼一头，准备把乌龟运到有水的地方去。后来乌龟不履约言，张嘴说话，从天空里掉下来，摔死。这个故事当然也是印度人民的创作，通过佛经传到中国来。沈从文把它涂上了地方的色彩，写成了一篇寓言小说。在他的一部叫做《月下小景》的短篇小说集里，除了第一篇以外，其余的都取材于汉译佛典。供他取材的书有：《长阿含经》《杂譬喻经》《智度论》《法苑珠林》《五分律》《生经》《大庄严论》《太子须大拿经》等。在这部书的题记里，他说：“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虽极短，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

以上举的只能算是几个例子，近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度影响并不止此。然而仅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从公元前几百年起，一直到近代，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直是持续不断。它就像是一条河流，有时经过深山，有时经过密林，有时流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又潜流于地中，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又潺潺细流，就这样，流下来，流下来，一直流到现在。

然而现在情况却大大地改变了。

1947年，印度获得了独立；1949年，中国解放。多少年来套在我们两国人民脖子上的殖民主义的枷锁，终于给我们挣断了。长期阻挠着我们进行文化交流和和平往来的绊脚石去掉了。我们之间几千年长久的古老的友谊又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八年多以来，我们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利用各种形式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工作。虽然我们做这工作已经做了几千年；但是从交流的规模上来看，从交流的范围上来看，从交流的意义上来看，这八年多的工作可以说是空前的。